

日前,马必前的《海南岛战役》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全程全景式描写1950年解放海南岛战役整个过程的纪实文学书籍。作者马必前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注重史实的考证,从而使《海南岛战役》一书在写作上有一种质朴而凝重的感觉。

英雄的声音 促我真实书写解放海南之战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今年是海南岛解放60周年,《海南岛战役》的出版,恰逢其时。作者马必前是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将军的儿子,1938年出生于战火硝烟中的海南岛的北黎湾边。

1950年代末,马必前曾就读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后来当过公安侦察员,曾任海南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海南省(筹建)工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2002年马必前退休后,开始积极搜集资料,撰写海南革命斗争方面的历史著作。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马必前这样讲述他提笔写史的初衷:“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就要为这块土地说话。”

据了解,该书稿在送给军史专家审读时,得到了专家较高的评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专家翟清华研究员认为,“该书较为真实地记载了海南岛战役的全过程,热情讴歌了党领导下的野战军、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为解放海南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该书挖掘、搜集了一批珍贵史料,叙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逻辑较为严密,叙事较为翔实完整,文笔较为顺畅生动,图文并茂,是一部弘扬革命优良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史学著作”。



马必前



《海南岛战役》马必前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0年7月

多角度记述解放海南战役全过程

海南周刊:海南岛战役发生时您只有12岁,并未亲身参与战斗,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您搜集资料,并创作完成这本书的?

马必前: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胜利后的第二天,我随澄迈县第四区支前队伍到达决战战场风门岭,清理战场时,亲眼目睹了战场悲壮、残酷的场面,终生难忘。

那些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前辈们,一直活在我心中。每当清明节,我和朋友们到风门岭决战纪念碑献花时,都仿佛能听到勇士们高喊:“长在红旗下,死在阵地前,为人民而战,死了也光荣”的口号声。

这是一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一场登陆战,我的父亲也参与了这场战役,战斗中许多先烈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英雄们的声音,催促我千方百计寻找相关资料,拜访众多参战的前辈,阅读、借鉴,研究核实战役的真迹,以“真”、以“实”,将海南岛战役的历史告诉读者,让读者知道今天的发展来之不易,借以纪念为海南岛战役而牺牲的先烈,同时也寄予怀念参加海南岛战役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

海南周刊:《海南岛战役》在写作立意上有什么突出特点?

马必前: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很特别,印有三个人的头像,一个是解放军第15兵团的司令员邓华,一个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还有一个是国民党军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

这三人是海南岛战役作战双方的主要指挥官。这也表达了我写书的立意,要全方位、多角度记述海南岛战役全过程。当时,我方参战的有40军、43军,还有琼崖纵队。三方在一个战场上如何配合,广东的群众如何配合支前,海南的群众如何组织接应,琼崖纵队怎样参战,我都分别从参战的各方出发,搜集整理资料并创作,这样看这个战役就会更加全面、立体。

成稿之后,为了确保史料的准确性,我将稿件送到军事科学院进行审读,并最终通过,最后,这本书是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为无名英雄著书立传

海南周刊:在创作过程,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马必前:在搜集素材时,常常会碰到无法查实人物的

姓名或牺牲地点的情况。

“我的父亲当年是在打海南的时候牺牲的,但现在已经查不到牺牲的地点了。”很多次,在清明扫墓时,在各个纪念地点碰到从外地前来扫墓的烈士家属时,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我的这本书涉及的人物有上千个,但更多的都是没有办法查询到名字,只好把故事写出来。

比如第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他是海南岛组织偷渡到雷州半岛迎接大军过海的老船工。据徐国夫回忆,王胖子在渡海作战时是他指挥船上的舵手。在王胖子的操作引领下,徐国夫带领的部队顺利登陆海南岛,但是王胖子的名字徐国夫却没有记住。而我经过多方查询,也没有结果,因此在写作时只好用“王胖子”来称呼这位渡海英雄前辈了。

战士、船工、热心迎接大军的群众,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合力创造了海南岛战役的奇迹,我希望他们的事迹能通过我的书永远被后人记住。

海南周刊:书中有哪些让你难忘的片段?

马必前:在主力部队渡海过程中,负责抗击国民党军舰的勇士们,让我最难忘。

木船对军舰,多么悬殊的实力对比,当时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就靠着劣势的装备创造了奇迹,成功地掩护了主力部队。

作战中,战士们把船打坏了,人负伤了,为了不影晌大部队的渡海速度,伤员们手拉着手,喊着口号沉下海面。

还有,在完成护航任务后,上级允许战士完成任务后回去,但他们不。抱着“要打到海南去”的信念,他们继续向南进发,碰上敌人军舰的围攻后,这些英勇的战士,宁愿沉入海底也不愿被俘。

写到护航战士海上牺牲这一段时,我的情绪起伏很大,有好几次都写不下去。但是,如果不把他们的壮举写出来的话,我睡不安稳,想着想着,又爬起来继续写。

写作时,我就好像跟战士们在一起战斗,因此,尽可能把他们的心境和高尚的行为描写出来,让读者和我一起分享这份感动。

书写海南红色历史是我们应负的责任

海南周刊:对于书写海南红色历史有着怎样的情结?

马必前:我从小就是听着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长大的,所以我对琼崖纵队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兴趣。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因工作关系,有机会旁听前辈们研究、编写《琼崖纵队史》、《中共琼崖地方史》的讨论会、审稿会,受益良多。

我是琼纵第二代,有一些事情还是自己和父辈一起经历过的。我们这代人不去整理、书写,将来还有谁来更客观、真实地写作?这是我们应承担的历史重任。

我有一个心愿,要完整地写完一部琼纵的历史,告诉人们,琼纵这几十年来到底在海南岛这片土地上做了什么,海南的群众是怎么支持革命的。

沙滩、海洋是大自然赐给海南的,也是许多外省人对海南的印象。但这还不够,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是海南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琼纵史是海南红色历史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

海南周刊:下一步还有哪些创作计划?

马必前:除了这本书外,我目前还组织了一批海南革命前辈的第二代,如张云逸的儿子等人,每个人撰写一些关于对父亲的回忆,组成了《我们的父亲》一书。可惜由于书号的原因,该书无法公开发行,只能内部刊印。

不过,这不妨我们为真实的历史留下文字的愿望,下一步的目标是组织这些海南革命前辈的二代人,再写一本关于我们母亲的回忆。



《熊猫》棉棉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七月版

百度一下棉棉的名字,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她写自己的学历:高中二年级。

这种自认为的学历大约给了她自豪感,又或者说,她故意将自己拥有的东西少说出一些,以显示她有能力对抗这个世界。

棉棉的写作在新世纪初出名,她和卫慧等一批七零后的美女作家被热爱命名的媒体捧红。棉棉是最有话题的一个。当时的她,大约在一个电台做主持人。这影响到她的写作。比如这部小说《熊猫》。《熊猫》竟然用无数个录音片断组成。这么形式主义的文学,除了个性,它很难承载更多的意义。

阅读这册修订版的《熊猫》,我十分庆幸地阅读到棉棉的自序:时空是个幻觉。

写作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件特别宿命的事情,差不多,只要是具有自我认知意识的女性都有虚构自己的倾向,或者在日记里,或者在更为广阔的文本里。棉棉也是这样一位女性。

她在自序里讲述了她与写作的关系,一开始是表达的,自然流露的,幸福的。是啊,那时的她刚刚成名,和写作的关系单纯,充满了理想主义倾向,并不清楚自己可以走向哪里。而后来,写作成

其实, 我是个演员

文\本刊特撰稿 赵瑜

为一种表演,越来越远离她最初的想象。写作不是她以为的那样,像电视剧中的女一号一样,有各个部门的人围绕着她转。写作只是一种普通表达方式,甚至,它并不比一个交通警察更有干预能力。于是,她退回到生活内部,寻找可以成为小说的一切素材,她幻想着,她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写进小说里,比如声音、色彩、隐私的尖叫、路人、熟悉的地点、电影片断、服装店、朋友的名字或者故事、食物……她仿佛找到了文学的田野,她准备好了一个录音机,将生活里的一切都录下来,以备将来写作时应用。

我相信,这是她写作《熊猫》的起始。

生活被录音机截取之后,一定会显得虚假。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少遇到自己的声音。如果不小心,有朋友将我们的声音录下来,播放给我们听,大致可以猜到到结果。那声音会让我们崩溃。是陌生感。

《熊猫》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棉棉在这部作品里虚构了很多个场景,每一个场景几乎都是对生活全部的截取,它美化了生活,还是丑化了生活,这无法评价。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本来以为记录会让写作变得容易很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真正令人发疯的并不是我的写作,而是现实本身。”

这话充满了幽默,现实的逻辑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僵硬,被物质完全融化的现实有着出人意料流向,生活时刻有被污染的危险,我们该如何赞美它。

《熊猫》是一个拼贴生活的写作尝试,在这部作品里,它没有集中的主题,没有高潮的设置和让人泪流满面的桥断。它有的是充满了棉棉智慧的语言碰撞,差不多,任何一段,都能吸引我们,我们会在棉棉的对话里分辨出,哪个是棉棉在白天的模样,哪个又是她在夜晚时的模样。

棉棉自己也承认,她写出的所有女孩子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她甚至为自己是个好演员而兴奋舞蹈。

作家阎连科说,写作其实是对他人人生的一种偷窃。而棉棉不仅是那个偷窃者,而且还是一个演出者。在一个又一个录音片断里,棉棉让故事有了发展,甚至是绝望的结局。《熊猫》里有一个臆想出的病毒,那病毒来历不明,却让男人失去欲望。